

解决了办案体制的弊端之后，加大国企反腐力度正当其时，这意味着2020年会有一场国企反腐风暴到来。

国企反腐，风暴正起

文 / 赵义

最近深圳一家国企的董事长被免职了，主要事由是被暗访组发现，该企业在年终述职会后，直接把会场变成宴会厅，80多人大吃大喝。为了避人耳目，所有白酒是在宴会厅角落一个隐蔽的房间内倒好再端上桌。喝的酒是市价约为8000元的1.3升装茅台酒，粗略估计总价在16万元左右。

茅台可不是一般的酒，在反腐败的正式话语中，它有个“特别”的称谓：特殊资源。

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被留置后，在他家中发现有一间房屋堆满了茅台酒，数量达四千多瓶。事实上，在听到风声后，他已经处理掉了一批价格最贵的年份酒。怎么处理的呢？先是把箱子撕掉，把盒子撕掉，或者干脆把酒倒在坛子里，这样还感觉不安全，最后干脆把这些倒在坛子里的年份酒又倒入下水道。

这真是荒诞而又真实的一幕，酒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真的就只是变成了特殊资源。2009年以来，随着茅台酒价格的暴涨，王晓光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为家人和亲属获取了4家茅台酒特许经营店专卖权，7年时间就获得130余吨茅台酒定额指标，获利4000多万元。

而袁仁国呢，一方面茅台酒成了搞政治攀附的工具，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等人都从他那里得到过茅台经营权和配额指标的好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利用茅台酒获利，自2004年以来，仅他的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元。

仅就这2.3亿元而言，如果相对于茅台作为特殊资源的特殊地位以及强大的溢价来说，还不能算是天文数字。让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节，

围绕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的经销商、批发商络绎不绝，他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门庭若市，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想拼命接近我的人很多，一天找我的起码有四五十个人。”

拼命接近的目的显然是冲着袁仁国手中的审批权去的。茅台酒的案例典型地反映了国企腐败的最突出的特征，一方面国有企业是资源高度集中，尤其是稀缺特殊资源，往往掌握在国企手中；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一把手不受制约和不受监督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不受制约的一把手，手中握有诱人的稀缺特殊资源的审批权，这个时候，如果人们再把反腐败的希望仅仅寄托于人的自律，那不是天真就是不负责任——真正还天真的人其实并不多。

比如华融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赖小明，他自己概括说：“党委书记、董事长、法人都是我一个人挑，纪委书记都还是自己党委下面管，他哪有多少权威啊？纪委书记是我的党委委员，我的部下，他很难监督我，说句实话。”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国有企业成了赖小明的私人领地，从管理层到食堂大厨，很多岗位他都安排了自己的老乡圈的人。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白向群对一把手权力的体会也同样“深刻”。他第一次受贿就是担任自治区团委书记，因为盖办公楼，接受了一位老板的好处。在担任乌海市市委书记的时候，乌海市境内有丰富的优质焦煤和其他多种矿产资源。白向群大肆插手煤炭资源配置，通过审批煤炭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来捞钱。在白向群案涉案的37个老板当中，有20个老板都涉及到资

源配置。白向群自己总结说：“在一个地区特别是当了主官，手中有两个权力，对干部来讲，他主要看你干部的任免权，对老板来讲是资源的配置权、土地的开发权。”

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国企反腐还受到反腐败力量分散的体制困扰。比如有关部门早在2014年就对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海开始调查，但3年时间里停滞不前，小道消息满天飞，其实是碰到了体制瓶颈。一方面是多部门重复调查，公安机关从金融诈骗的角度调查，省国资委纪委、省检察院则对郭海涉嫌失职渎职问题开展调查。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人员失职（渎职）罪，当时的管辖权限是在公安机关，不在检察机关，所以检察机关无权，也无法对郭海涉嫌失职渎职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但事实上，公安机关经常办理的

是经济、刑事犯罪案件，职务犯罪类案件办得很少，这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监察体制改革后，这种多头管理、各管一段的情况得到了纠正，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全部公职人员都被纳入监察监督的范畴，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比如前段时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云公民作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不属于公务员，但属于监察法上的“公职人员”，因此国家监委可以对其进行监察调查。即使国有企业员工一般来说不是被监察对象，但是，当这些人员基于法律的授权或者基于委托等在特定条件下，符合“行使公权力”“履行公务”而又违反廉洁从政、廉洁从业的要求时，就可能被纳入监察对象范围。

从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来看，2020年将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加强国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查处地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题。在十八大后的多轮巡视中，国有企业存在的靠企吃企就多次被披露。国有企业因为资源集中和权力集中造成的腐败存量和增量风险，仍然不可低估。解决了办案体制的弊端之后，加大国企反腐力度正当其时，也意味着2020年会有一场国企反腐风暴到来。■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

